

申城再添文化新地标！上博东馆今启用

■本报记者 李婷

申城再添文化新地标！伴随着首个特展“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开幕和首个常设展厅“中国古代青铜馆”试开放，历时六年多建设的上海博物馆东馆2月2日启用，拉开全年“开放三部曲”的序幕。这一上海市重大文化设施位于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952号，将与上海科技馆、上海图书馆东馆、东方艺术中心等形成文化集聚效应。

作为上博东馆第一个特展，“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把目光聚焦到长江上游“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古代文明中心，向公众全面揭示古蜀文明的面貌、内涵、特点以及来龙去脉，呈现中华文明发展的多元一体和五个突出特性。“长江造就了从巴山蜀水到江南水乡的千年文脉，是中华民族的代表性符号，也是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发展的摇篮。”上海博物馆馆长褚晓波透露，为赶在春节前完成大展的各项筹备工作，该馆工作人员精心策划并全力以赴，向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8家文博考古机构借展，集结了363件文物。这些文物翻山越岭，跋山涉水来到上海，运输行程超过1万6千公里。

这是迄今为止古蜀文明考古出土文物在四川省外最大规模、最高规格的展览阵容，也是“何以中国”文物考古系列的第三个展览，汇集了最新考古发现，最新文物修复成果。如，三星堆遗址三号坑出土的青铜面具是目前已知该遗址发掘的体量最大、保存状况完好的大型青铜面具。三号坑的高冠立发青铜人头像，四号坑出土的长发青铜跪坐人像，八号坑出土的竖披发青铜人头像、尖帽青铜人头像、青铜立人、大神兽等都是三星堆遗址历次发

掘没有出现过的。金沙遗址出土的十节玉琮是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典型器物，自出土后就离开过四川。这次到上海来也是其离开故土数千年后，首次荣归故里。除了两个特展厅约2000平方米的空间呈现重要考古成果，本次展览还配套推出“邂逅三星堆12K数字艺术展”，带人们“重返”考古现场，沉浸式体验三星堆的神秘世界，展示文物上那些难以被肉眼发现的细节。

上博东馆首个常设展厅“中国古代青铜馆”也于今日起同步对外试开放。整个陈列精选500余件展品，反映公元前18世纪夏晚期至公元19世纪中叶清中期的3600年间，中国古代青铜器出现、发展、演变的历程，是目前海内外唯一的体系最完备的中国青铜器通史陈列。据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研究馆员马今洪介绍，“中国古代青铜馆”最早展出于1973年，这是其第六次陈列改建，在原有的体系上延伸了时间线，将秦以后的青铜器纳入其中；板块内部也进行了调整，比如，更新期青铜器原来将所有器物按照器类陈列，吸引最新学术研究的推进，现细化为中原文化、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草原文化单元。原陈列中的绝大部分展品继续展出，如镇馆之宝大克鼎、牺尊、子仲姜盘等，同时新增近百件展品，包括夏晚期的绿松石牌饰和单翼铃、铸有早期青铜器铭文的甲壶、战国的商鞅方升、新莽的同律度量衡诏衡杆和诏版、北宋的大晟编钟、明代的喷水鱼洗等，说明牌中的生僻字皆标有汉语拼音。

据悉，第一阶段开放空间只占东馆展陈空间的25%左右，为确保人员安全和参观体验，每个开放日接待量上限为8000人次，需通过上海博物馆微信公众号预约。



▲牺尊（春秋晚期）

上博东馆首个常设展厅“中国古代青铜馆”今起同步试开放。整个陈列精选500余件展品，是目前海内外唯一的体系最完备的中国青铜器通史陈列。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制图：冯晓瑜

▲豫角西周早期

对谈录

上博东馆首个特展聚焦长江上游“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的古代文明中心

古蜀文明何以“星耀中国”

嘉宾：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专家咨询组组长）唐飞（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总领队）胡嘉麟（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研究馆员）
主持人：李婷（本报记者）

在上海这个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主持人：与其他以古蜀文明为主题的展览相比，这次的“星耀中国”特展有何特别之处？

唐飞：本次展出的精品众多，包括三星堆遗址最新出土文物100多件，像铜权杖、铜虎头龙身像、铜大神兽、铜猪鼻龙形器、扭头跪坐人像等“重器”，均为之前所未见，系三星堆遗址首次发现；还有铜人像、铜人头像、铜面具、铜神树、玉璋、玉戈等古蜀文明的典型器，同类文物有的虽然在早些年发现过，但每一件都不一样，都很精彩。

除此之外，一批古蜀文明的代表性陶器亮相本次展览，像陶盂、鬲形杯、瓶、高柄豆等，有早年出土的，也有最新出土的，大多是第一次对外展出，它们是了解古蜀文明的另一把钥匙。

胡嘉麟：以往的古蜀文明展基本是以出土单位划分单元板块，比如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组成一个单元，金沙出土的文物组成一个单元。这次展览打破常规，将不同出土单位的展品重新组合。这种策展思路有两个好处：一个是我们能看到古蜀文明发展的连续性，而不是断裂的。古蜀文明有源头、有余韵，与三星堆、金沙的文化面貌存在必然的联系，这是以前我们所忽视的。另一个是古蜀文明的内涵和外延非常博大，很难通过一个展览全部讲述清楚，所以就需要在有限的展厅里告诉观众古蜀文明最核心的内容是什么。

整个展览划分为序厅、天行乾道、地势坤物、人和明德、尾厅五个部分，核心内容就是中间的三个部分。我使用了“三才”的观念。天、地、人“三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强调宇宙中三种基本元素的关系和互动。“天”主要讲述古蜀文明的神灵崇拜和精神信仰。“地”主要讲述表现古蜀文明上层建筑的各种物质文化关系。“人”主要讲述古蜀文明的社会生活和礼仪活动。三个单元板块的展品虽然有所交叉，却是各有主线，基本上都是围绕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包容性、创新性等进行阐述的，显示天地人三者之间不可割裂的互动关系。序厅以后以三星堆的青铜眼形器开篇，尾厅以前以三星堆的青铜蛇形器、整个展览就是围绕着一个“蜀”字在讲述古蜀文明，这个也是展览策划中的一个巧思。在展陈设计上，我们希望能够重现当时古蜀人进行祭祀的场景，设计了几组“阵列”来让观众感受当时的仪式感。具体的文物陈列也保持了上博一贯的风格，将最佳欣赏文物的角度展示给观众。

主持人：在上海这样的国际文化大都市举办“星耀中国”特展的必要性是什么？

王巍：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对文化高度重视。我举个例子，11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在上海举办“世界考古论坛·上海”，如今已经举办了五届。两年一次评选的“世界考古论坛终身成就奖”和“世界考古论坛重大田野考古发现”，被看作国际考古界的奥斯卡奖。

上博东馆首个特展聚焦古蜀文明展，跟上海对文化的高度重视是很契合的。可以预见，这次的展品数量、质量，也会远高于其他同类主题的展览。它便于上海市民近距离领略古蜀文明的魅力，同时这些城市的国际化也能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多元一体、开放包容的中华文明。这个展览在新落成的上博东馆举办，可以说是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唐飞：“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四川与上海“共饮一江水”，历来交流密切、关系友好，举办这个展览是两地友好关系的见证，是川沪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

上海是文化建设的高地，也是展示中华文化的重要窗口。通过这个平台，展示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辉煌灿烂而又别具特色的出土文物，对于推广古蜀文化、传播中华文明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也将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备受瞩目的“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2月2日在新启用的上海博物馆东馆揭开面纱。古蜀文明出土文物总是令人过目难忘，它缘何如此神秘而独特？其基因源自哪里？有哪些待解之谜？我们邀请考古领域和青铜研究领域的专家给予解答。

古蜀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中原王朝始终保持密切联系

主持人：上海博物馆东馆举办“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的消息，引发广泛关注。古蜀文明为何重要，它在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王巍：古蜀文明是中国西南地区的区域性文明，年代与中原地区夏商周时期大体相当。实际上，同一时期，中原王朝的周围有多个这样的区域性文明，可以说是万国林立。比如西南的古蜀、江西的新干，北方有土方、鬼方、羌方，东边还有东夷等。它们跟中原夏商王朝有密切的关系，起码名义上都是臣属于夏商王朝，受其影响，同时又有一定的独立性，所以文化上有一定的一致性，又有自己独特的特点。

古蜀文明应该说是特点最鲜明的一个。其代表性遗址三星堆于2013年和2022年两次被列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说明了古蜀文明的重要性。从发掘出土的青铜人头像、神树、面具等，可以看出其文明发展水平之高，尤其它的精神信仰特别突出，在《山海经》当中也有所记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简单来说，古蜀文明是夏商时期王朝周围区域文明当中发展水平最高、文化最有特色的一支，是中华文明满天璀璨群星当中最亮的一颗，但夜空中还有一个月亮，就是中原地区的夏商王朝。

唐飞：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是长江上游文明发展的高峰，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跨河建城、官殿区与祭祀区分列南北的“法象天汉”城市规划模式，因地制宜营建城市防御措施、对水资源进行充分利用和管理，并反映出神权与王权并重的社会治理模式，是古蜀文明在城市营建方面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

古蜀文明是三四千年前连接以中原地区为代表的农业文明区和以“半月形地带”为代表的游牧文明区的地理单元，不同区域文化要素在这里交流、融合、创新，又被中原文明和其他文明吸收，深深融入中华文明连绵不断发展的基因之中，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融合发展的鲜活见证，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

主持人：与同时期中华大地上产生的其他区域性的文明相比，古蜀文明最主要的特点是什么？

王巍：古蜀文明最大的特点是神秘性，出土的文物给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一特色的形成，首要前提是积极吸收中原夏商王朝的文化因素。比如，使用的玉戈、玉璋、有领玉璧等都是夏商朝发明的。当然，传到古蜀的时候，究竟是夏代的晚期，还是已经进入到商王朝纪年，两种可能都存在。青铜冶炼铸造技术是从商王朝传过去的，不一定是直接传，也可能是先传到长江中游，因为这一带的湖北黄陂盘龙城是商王朝控制的铜矿重要据点，也是青铜器生产地，与长江上游的成都平原更接近，然后经此再传至古蜀。

第二是在学习借鉴的基础上，有自己的发明和创造。以青铜熔接技术为例，先采用商王朝青铜冶炼铸造技术分体铸造各个部件，再将其连接成为一体，创造性地铸造出复杂的组合青铜器。比如神树神鸟相结合、结构复杂的神

坛、顶尊人头像等。我们可以看到不止一尊铜人的头顶着青铜礼容器，而且是跪姿，显示了古蜀对商王朝系统青铜器格外尊崇，这一点非常耐人寻味，也值得高度关注。

非常具有特色的是，古蜀人用高超的青铜铸造技术，把他们的思想、信仰的世界展现出来。他们的信仰体系非常丰富：有祖先崇拜，对蚕丛、柏灌、鱼凫、杜宇、鳖灵等历代蜀王的崇拜；也有自然崇拜，包括了对太阳、神树、神鸟、山川等的崇拜。从出土文物可以看出，龙的形象就有近十种之多，鸟的形象有十几种。

古蜀文明与中原王朝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当然，中原王朝辐射、影响各个区域性文明的同时，也广泛吸收周围先进的文化因素，因此才能够发展成为引领。比如，玉璧最早出自良渚文化，夏商朝吸收各地的因素将它礼器化。玉璋是黄河下游地区史前时期的发明，被中原的夏王朝吸收过去成为重要的礼器。从玉璋分布来看，最多还是在河南，以此为中心向四面八方辐射，包括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金沙、福建、香港，甚至最远到了越南北部。这也体现了中原礼制的影响力——夏王朝通过建立一套完善的礼乐制度维护社会秩序，被周围区域文明所尊崇和吸收。

唐飞：古蜀文明极具辨识度，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的文化瑰宝特征鲜明，青铜面具、人头像、神树、四鸟绕日金箔饰等风格独特的文物写意与写实并存，体现出古蜀人的非凡的想象力与创造力。陶盂、玉琮、青铜尊等文物又无不显示出古蜀地区与中原及周邻地区间文化因素的相互影响，生动地展现着文化交流、融合与创新的历史过程。

胡嘉麟：这次“星耀中国”特展，我们向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8家单位借展文物。四川省内有12家借展单位，几乎涵盖了该省各地的重要博物馆，四川省外有16家借展单位。如果算上我们上博自己的藏品，以及知名工匠博主制作的仿三星堆的现代艺术品，这个展览是由30家单位的藏品组成。从这次借展的地域范围就可知，古蜀文明与中华文明的关系非常密切——它不是西方的、外来的文明，更不是外星文明，而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兴起和繁荣是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不同族群和文化长期交流、互动的结果。考古学强调“以物证史”，这个展览就是要通过各个地区与古蜀文明有联系的文物来阐述古蜀文明的面貌、内涵和特质。

三星堆遗址八个祭祀坑的发掘给考古界带来了巨大的惊喜，也留下诸多谜团

主持人：三星堆和金沙是古蜀文明最具代表性的遗址，两处遗址也在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它们是什么关系？有何异同？还有哪些古蜀文明相关遗址值得被关注？

唐飞：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是前后相继的古蜀国都城，文化属性具有明显的传承性，皆为古蜀文明的典型代表。

两个遗址在城址选址、功能布局、居址、墓葬、祭祀行为与代表性文物方面具有诸多相似之处。城址选址均北部临河，又有一条河流穿城而过，将城址分为南北两部分，水陆交通兼具，重视水资源利用与管理。官殿区位于城北，祭祀区位于城南。盛行干栏式建筑。葬俗简约，墓葬以小型为主，随葬品较少。祭祀活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突出地位，均有整根集中埋藏的象牙。金面具、铜人像、铜眼形器等极具辨识度的文物在两个遗址均

“星耀中国”展品。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制图：冯晓瑜